

□ 荷花池

工作。由此，我从父亲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人和事。

从2016年起，我们“一二·九”运动后代联谊会开始编写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几本书籍，使我对这个运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接触到一些说法，例如说宣传“一二·九”运动会鼓励学生与党和政府对立，对宣传和纪念“一二·九”运动有顾虑。近几年，通过编书和在给清华一些院系宣讲“一二·九”运动的过程中，我也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我觉得一提到“一二·九”运动，人们就想到学生上街游行，这是社会上一些人的认识，不是“一二·九”运动的内涵。我认为产生这些看法的原因，在于对“一二·九”运动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应当如何宣传“一二·九”运动缺乏清楚的认识。我愿意借此机会分享我的三点看法，与大家共同探讨。

第一点：“一二·九”运动是学生自发的，还是党领导下发动的？这个关键问题涉及运动的领导权、运动的走向和最终达成的目标。我父亲曾告诉我，一二九研究班最主要成果，就是搞清楚了党领导发动“一二·九”运动的整个过程。这在中央党校研究班编的《一二九运动史要》和我们联谊会编的《一二·九运动画传》中都有清楚的阐述。社会上之所以出现运动自发论，一是由于当时北平地区党组织破坏严重，处于地下状态，运动初期的学生骨干大多还没有入党，对党组织的活动状况和有关方针问题的争论都不清楚，因此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反映不出党的领导。二是社会上的某些势力刻意渲染自发论，意图使青年学生摆脱党的领导，对这个问

题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还应当认识到，党的正确路线领导，是运动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并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当代青年应该牢记这个历史经验。回顾整个“一二·九”运动的历程，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35年11月北平学联成立开始，到1936年的“三三一”抬棺游行，运动的走势反映了学生初期的不成熟，学生高涨的爱国热情遭遇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激起了学生的愤怒，矛盾越来越尖锐，学生与学校当局也处于对立状态。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从1936年春刘少奇同志主持北方局开始，到1938年民先队和全国学联完成历史使命而停止活动为止。在这个阶段中，中共北方局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批评了关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倾向，避免了学生和国民党当局打内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是“一二·九”运动伟大的成果。以往对“一二·九”运动的宣传，侧重于反映学生反抗镇压所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和爱国精神，给人的印象“一二·九”运动就是学生上街示威游行，而没有充分反映党对运动方向的引导和纠偏，以及学生们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所进行的大量建设性工作（比如对工农大众和文教各界的抗日宣传，对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军队的统战工作，促成西安事变发生，等等），我认为这是宣传工作中需要注意和改进的地方。

第二点：“一二·九”运动不仅体现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担当精神，也体现了那一代学生能够深入思考社会问题，自觉选择正确道路的理性精神。比如“一二·九”的领袖人物蒋南翔，既能够

发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激情呐喊，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又非常理性地提醒左派同学不要喊“杀掉蒋介石”的口号，以免脱离群众，造成政治上的被动。曾任清华党支部书记的杨学诚，是一位热血青年，西安事变后，他去延安参加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反映了学生们对蒋介石抗日态度依然消极的不满，提出“再来一次一二·九”的口号，但是他认真聆听了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话后，认识到自己的偏颇，在以后领导学生运动中坚决贯彻了党的方针。这两位清华的学生领袖，都是既有激情又有理性的。在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众多的学生骨干也都体现了热血和理性精神的结合。面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他们能够坚决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将“打倒汉奸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转变为“拥护宋委员长和29军抗日”，团结国民党军队和社会各界共同抗日。在校史馆的展览中有这样一张照片，是宋哲元将军站在方桌上，接受清华救国会的献旗。这是1936年11月29军在河北固安演习，北平学联委托我父亲动员清华燕京二百多名学生前去慰问，我父亲定制的锦旗上写着“国之干城”，是他依据《诗经》“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演绎而来，意在勉励29军官兵成为保家卫国的盾牌和长城，这张照片特别能体现出学生们与华北军政当局从对立转变到共同抗日的成果。学生们还通过下乡宣传的考察，认识了中国的国情，比较了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选择跟共产党走改造旧中国的道路。我认为宣传工作如果只

讲“一二·九”运动中学生们爱国精神和不怕牺牲，而不讲学生们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能够理性思考、选择正确方向的一面，是不利于对学生进行正确教育的。

第三点：毛主席评价“一二·九”运动为抗战准备了思想、人心和干部。以往对“一二·九”的介绍，只着重于为抗战准备了思想和人心的过程，对“一二·九”为抗战准备了干部介绍得很不够。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教授（1938届历史）说过，当年在清华他是立场偏右的，参加运动的那些同学才是清华真正的精英，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同学跟他们走。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大量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队伍，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条抗日战线的干部水平和工作水平，使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面貌远好于国统区，这是到访根据地的中外来宾一致公认的。“一二·九”那一代青年不是只会喊口号的空头革命家，而是能用自己的才智在抗战各条战线上（包



出席学校活动的“一二·九”运动亲历者校友后代合影。左起：高原之子高永利、何礼之子何吉林、赵继昌之子赵裕民、黄葳之女欧阳晓光、吴瀚之女刘爽、李伟之女李慧政、李昌之子李炎、校友总会黄文辉

□ 荷花池

括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新闻宣传、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军工科技、外交斗争、隐蔽战线等）作出杰出贡献的实干家，在我们编写的《一二·九运动画传》中有详细介绍，值得当代青年学习。

今天纪念“一二·九”运动90周年，我想起1987年母亲去看望病重的蒋南翔时，他说的那句语重心长的话：如果青

年学生愿意跟党走，我们党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红色文化传承，总体的政治环境已经远好于当年。但是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如何引导青年坚定跟党走，这个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完整准确地传承“一二·九”精神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凝定自我，赋形人生：作为生活实践的文学

○姜涛（1989级电机）



姜涛教授讲话

1926年，朱自清先生在《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呼吁打破“正统国学”的观念，改变厚古薄今的风气，倡导“现代研究”。他在创作和学术上躬行实践，成为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重要开拓者。1930年代中期，叶公超先生在清华创办《学文》月刊，为清华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师生提供了一个发表创作与文学研究的阵地，校园文化风貌因之一新。清华先辈们筚路蓝缕、垂范后世的努力，至今仍使我们感怀并受到鼓舞。

为鼓励清华学子关注当代社会生活，

激发文学爱好者的创作与批评热情，清华大学中文系于2004年设立了“朱自清文学奖”，该奖面向所有清华在校生征稿，迄今已举办了十届。本文是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涛校友在2025年“清华大学朱自清文学奖”颁奖礼上的讲话。

我是清华九字班的老学生，但我这个“9”非常古早，不是19，不是09，也不是99，是89。我1989年进入清华读书，1997年毕业，连续在清华读了8年书。人生中最重要从少年到青年的这个阶段是在清华度过的。

今天能见到梁曦东老师，我有点激动，也有点紧张，因为我就是电机系的学生，本科读的生物医学工程是电机系的一个专业。从电机系里孵化出很多专业、院系，包括计算机系、自动化系，生物医学专业后来也独立出去，单独成系。我是电机系的学生，但不是个好学生，当年读书的时候三心二意，好多时间花在搞文学上面，结果成绩很糟糕。毕业时就换了一个赛道，改读了中文系的研究生。今天见了